

853850

明朗的夜

〔苏〕 诺·顿巴泽 著
郑海凌 译



853850

明朗的夜

0326

—
6173

[苏] 诺·顿巴泽 著
郑海凌 译



明 朗 的 夜

〔苏联〕诺·顿巴泽

郑海凌 译

责任编辑 李云阁

黄 河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省新郑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6.625印张142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53册

ISBN 7-5400-0042-0/I·42

统一书号：10385·166 定价：1.20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城。

大学生季穆尔从小没有父亲，母亲也被流放他乡。没有母爱，没有家庭温暖的他，渴望得到一些珍贵而美好的东西。他以美善的心看待社会，看待生活，看待友谊和爱情。作品描述的正是苏联青年一代新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绚丽多采的爱情生活。

一本好书，一个好作家， 一个好翻译家

（代序）

刘亚洲

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推荐《明朗的夜》。

我的朋友郑海凌把这本书的译稿送给我时，是一个夜晚。我只翻了几页，便再也不能够抵御它的诱惑。我把那个夜晚整个儿地交给了它。它把一笔财富（纯精神的）交给了我。我只读了一遍，但我不动摇地相信，我立即会再读第二遍、第三遍……像我读《上尉的女儿》那样，像我读《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像我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

不知为什么，读苏联的文学作品，总觉得那么近。甚至我读国内某些作品时，也没有觉得这么近。我是学英文的，去过几次美国，而且在那里讲学近一年。美国的文学作品也是我所喜爱的，有些还令我大大激动，可仅是激动而已，并不觉得近。

我们和我们的父辈受了苏联文学多少影响，是不用多说的。托尔斯泰、果戈里、普希金比列宁和斯大林早一些时间进入中国，便一起在这里愉快地生活着，还要继续生活下去。爸爸告诉我，打仗时，军中有些文化教员，行囊里除了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及课本外，便是苏联小说。我爸爸最崇拜的一位文化教员在阵地上看《白痴》发了迷，敌人炮弹呼啸而

来，竟忘了躲。他死了。他和《白痴》一起永生。

苏联还叫俄国时，就是个文学大国。苏维埃站起来后，这个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俄罗斯是个有文化的民族，而有文化的民族是百倍重视文学和文学的制造者的。文学的繁荣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而成熟的民族总是用思想（文学无疑属于这个范畴）去影响别的民族。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苏联出口到中国的，而这种历史性的出口是以文学的出口作为先导和铺垫的。

让我们继续受影响吧。让我们像鲁迅、巴金那样受影响吧。让我们像我们的父辈那样受影响吧。一个不受影响的人是笨的。一个不受影响的国家是昏暗的。一个不受影响的民族是前进不了的。不前进，则倒退。

《明朗的夜》很好。

诺达尔·顿巴泽是苏联当代著名作家，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作协主席。不幸的是，他于前年走了，永远走了。他没有活着看到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明朗的夜》在中国出版。但是他看到了《永恒的规律》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这部获列宁奖金的小说曾在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掀起一股不小的“顿巴泽热”。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是在他生前便读过了《永恒的规律》的。我爱藏书，但十分苛刻，质量不高的书休想在我的书柜里找到位置，而《永恒的规律》气宇轩昂地立在我书柜中相当显眼的地方。我已为《明朗的夜》预先留下了位置。但他走了，我仍想为他的书继续留位置，又怎么能够实现？他才五十六岁，就匆匆忙忙给自己的生命划了句号。顿巴泽，你急什么呢？而上帝为什么又那么残酷，总是不让有才华的人多留一会儿，

哪怕一年，哪怕一天，哪怕一小时。

顿巴泽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生活和普通人的爱。相信人、相信人心中美好方面能取得胜利，是他创作的审美核心。而《明朗的夜》，几乎是最能体现他这一特点的大书。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深深感到，他所拥有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他所擅长的，正是我们感到陌生的；他所讴歌的，正是我们中某些人所不齿的。作为苏联作家群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顿巴泽已走向世界。我们也摩拳擦掌准备这样做。如果真的想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那么，读一读他的作品吧。

对中国读者来说，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是大作家的大手笔还嫌不够，还要加上翻译家的手笔，而翻译委实是一种艰辛的再创作。关于那些美丽的大书被拙劣的翻译糟蹋了的故事，我们一听再听。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国界的。一九八五年我访问美国时，在华盛顿的书店里看到巴金老先生的《家》、《春》、《秋》摆在书架几乎让人够不着的地方，积满尘土，怪凄凉的。一问，这书店才进了五本，卖了一年竟连一本也没卖出去。巴老的书极其辉煌，我敢打赌一点也不亚于福克纳和海明威的，但为什么会受这般冷遇？细细一了解，才明白问题出在翻译上。巴老一纸优美的文字全被残忍地破坏了。

而《明朗的夜》译文很好。译者郑海凌不仅外文出色，中文尤出色，因此才使这部书具有特殊的魅力。

海凌是我朋友。三年前我们曾在一个单位共事。他搞俄文，我搞英文。他去过苏联，我去过美国。他一口俄语相当好，我自信自己英语也不错。他热爱苏联文学，我也热爱苏联文学。

我相信我是最早对他的文学翻译做出评价的人。大约是七年前的一天，他拿来一叠稿纸，说是他翻译的小说，让我看。记得那是蒲宁的一篇小说。我是多少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态度开始阅读的。而只读了一页，我便不能不认真起来。文字很帅，叙述准确而且老到，许多地方分寸感极强。一霎间我竟有些怀疑这是不是他译的。我从译文的风格上看到了傅雷和瞿秋白。他是否刻意学习他们，我不知道，但那一刻我反正是强烈地感到了二位大师的影子。我读毕那篇小说，问他“可还有？”他又拿来一篇。我又一次为他的译文所惊叹。我懂外文，也翻译过外国小说，甚至还出版过一本不像样子的小书，我深深理解拼音文字转变成象形字是多么不易。同时我也捕捉到了他特有的风格。我知道这两篇译文真真是出自他的手。

我对别的同事说：“海凌的译文真漂亮！此人不可小觑。”有些人对我的话完全不以为然。他们不善于而且根本是不乐于发现比他们优越的人，而比他们优越的人实际上太多了。有人冷冷说：“不就是两篇短短的小说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说：“不，他马上就会翻译书的！”

果然，他这样做了。他的译作陆续出版了。

海凌极刻苦。我也刻苦。可以不谦虚地说，在我们那时的单位里，我俩最刻苦。我们从不睡午觉。中午，他在他办公室里，我在我办公室里，稿纸一摊，便开始了拼杀。我们当时都有自己的工作，于是在办公时间内翻译和写作就变成非法的了。我们只能使用中午，晚上。即使如此还是堵不住众人的口。因为你想出名，而且有可能出名，你就伤害了别人。你虽然在于自己的活，但你还是威胁了别人。在某些人

的眼里，可以容得下一位庸才，却容不下一位天才。不用讲什么天才了，就是一个比较聪明再兼刻苦的人都容不下。幸亏我顶住了这一切。幸亏海凌也顶住了这一切。记得有一个夏日的中午，我去他办公室倒水，敲开门后，一个情景使我吃了一惊。他光着膀子，伏案在写。汗水顺着他那具有典型河南人特征的胸膛和脊背朝下淌。由于汗水太多，竟闪闪发光呢。那一刻我觉得他肩膀好厚好厚。这样厚的肩膀无疑是承受得住一切舆论压力的。

他成了翻译家。

今年三月，《文艺报》刊登了我国首届“彩虹”翻译奖发奖的消息。当我第一眼看到标题时，立刻涌出一个强烈的念头：准有郑海凌。准有。如果这是第六感，那么这第六感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

一点也不错，他在中间。虽然只有三名获奖者，他在中间。

生 日

一〇七号教室里演出了一场悲剧。受人尊敬的卡西扬·戈吉恰什维里教授今天亲自主持政治经济学考试。这件事本身对我们来说并不突然。所以谁也没有为这次考试感到焦虑。可是，想不到柳芭·诺季娅抓破了自己的脸，哭喊着从教室里跑出来，她说“他全听见了”，这时我们才大吃一惊。本来嘛，我们这位善良的聋教授主持考试，你即使把重商主义理论答成苜蓿根的结构，也用不着担心有什么影响。然而谁能想到，他偏偏在这时候，在春季考试的最紧张的时候突然恢复了听觉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个人来说，可以说考试已经没什么指望了，但是由于受好奇心驱使，我还是跑到柳芭面前。只见她脸黄得像只熟透的香瓜，两眼呆呆地盯着她的记分册上的惹人注目的二分。

“喂，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拉了拉她的袖子，问道。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柳芭哼哼唧唧地说。

“难道他不知道，在记分册上是不许打二分的？”古拉姆问道。

“我对他说了。可是他说他不知道这个规矩，说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给人打二分。我现在该怎么办？”柳芭的眼睛里

噙着泪花。

“他到底给你提了一些什么问题？”古拉姆问道。

“第一个是商品周转，第二个是通货膨胀，第三个我忘了……”

“你什么也没答上来？”

“我开始回答来着……”

“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夏天是在乡下度过的，在菜园里帮助外婆干活……我外婆是个善良的女人……”

“而他说什么？”

“他说，那就让善良的外婆给你打分吧……”

柳芭用记分册捂住脸，呜呜地抽泣起来。

教室的门打开了，我们的班长叶弗列姆手捧着学生名单从教室里走出来。

“巴拉米泽和契契纳泽，进来！”他宣布说。

“败类！这是按什么顺序排列？‘巴’之后就轮到了‘契’！”古拉姆气愤地说。

“从前面叫一个，从后面叫一个！”叶弗列姆用眼睛指了指房门，解释说，“这和我毫无关系，这是教授的吩咐。”

我不知道这叫什么病。这种病发作的时候，心脏直向上撞，舌头不听使唤，额头上冒出一层冷汗，两腿发软，两手颤抖，眼睛发黑。然而我瞥了古拉姆一眼，只见他用一只大手帕擦了擦额头和双手，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我这才明白，这种病是传染的。

我们踮着脚尖走进教室。笑容可鞠的教授坐在铺着绿呢

子台布的桌子旁边。我一眼便看见他那副惹人注目的金边眼镜。眼镜是新配的，边框很大，眼镜腿上连着那只要命的微型助听器。

“请坐吧！”教授很有礼貌地请我们坐下。

我们呆立不动。

“你们怎么啦，没听见？”教授提高了嗓门，“请坐到桌子前面来！”

我们在桌前坐下来。桌子上摆着一迭白色的考签。这些考签几乎还没有人动过，像死刑判决书似的等待着我们。

“拿了考签，就开始准备吧！”教授吩咐道。

我拿了一张考签，匆匆地用眼睛掠了一眼，马上就明白了，恰好是那张考签，这道考题我准备到老死也答不上来。古拉姆也拿了一张考签，迅速地朝考签上瞟了一眼，我发现他眼睛里流露出被送去当供品的小牛犊的悲哀。

“您叫什么名字，姓什么？”教授问道。

“季穆拉兹·巴拉米泽！”这是我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教授在小本子上记下来。

“您呢？”教授转向古拉姆。

“契契纳泽！”古拉姆精神饱满地回答说。

我和古拉姆坐下来，按照考试规则相互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我怀着极为冷静的心情开始读自己的考签。第一个问题是地租。

“大概可以开始了吧？”教授突然问了我一句。

“好吧！”我回答说。

古拉姆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好，开始吧！”教授高兴起来。

“地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土地是可以出卖的。一般说来，那里的一切，甚至包括良心，都可以出卖。良心当然更不值钱。资本家依靠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收入叫做地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苛捐杂税。农民在军事税的桎梏下呻吟，因为资本家要炫耀武力。军备需要大量开支，开支就是金钱。他们的金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事件演变的逻辑提出这样的问题。事情很明白，通过征税！……”

“您叫什么名字，年轻人？”教授打断了我的话。

“季莫，巴托诺！”

“您听过我的课吗？”

“这叫什么问题，敬爱的教授！”我生气地说。

“可我怎么不记得您呢……而您我根本不认识！”教授向古拉姆转过身去。

“但是我们非常了解您，敬爱的教授！您名叫卡西扬·戈吉恰什维里，是我们爱戴的教育家。您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怎能不听您的课呢！您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对于您讲授的课程，我们一般不记笔记，而是如饥似渴地往心里灌！”古拉姆激动不已。

“那好吧，您说说您如饥似渴地灌了些什么？”教授不让他再说下去。

古拉姆呆若木鸡。过了一会儿，他像刚从水中爬出来的狗似的使劲摇了摇头，然后瞥了我一眼。我轻轻地咬了一下舌头，才没有笑出声来。

“怎么回事？”教授重复一句。

“您对巴拉米泽提的问题他回答完了吗，敬爱的教授？”古拉姆向我送了一个迷人的笑脸，低声说。

“巴拉米泽在思考第二个问题。”

古拉姆又看了看考签，然后向上翻了翻白眼，开始在空中寻找答案。然而他在那里什么也没有找到，然后把目光转移到正常位置，突然向教授问道：

“可以换一张考签吗？”

“可以。”教授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古拉姆那只颤抖的手在那些考签上摸了一会儿，然后停在一张考签上，好久没有动弹。

“契契纳泽，除您之外，我还要考其他同学！”教授提醒说。

古拉姆的手动弹一下，然后抬起来。他拿了一张考签，放在眼前瞧了瞧。他的嘴唇在蠕动，大概在重复考签上的问题。

“喂，您要说什么！”教授说着，神经质地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可以换几张考签？”古拉姆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请把您的记分册给我！”教授伸出一只手。

古拉姆立刻软了下来。

“饶了我吧，教授，要不然我要失去助学金了！”

“助学金？年轻人，我曾失去一位朋友，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没关系。瞧，我不是活得很好吗？”

“您那位不幸的朋友他发生了什么事？”古拉姆大为感动。

“契契纳泽！把记分册给我！”教授重复一句。

“帮我一把吧！”古拉姆的眼睛在哀求我。

“敬爱的教授，您给他打二分是不公正的。我们俩一块

儿复习了一个通宵。”我替朋友辩解说。

“年轻人，我在牛津大学和张伯伦同学五年。他成了英国首相，而我还坐在第比利斯教你们这些白痴。明白了吗？”教授问道。

一切都像太阳一样明朗。然而古拉姆仍然不愿退却。

“敬爱的教授，要知道，您是百分富翁。”古拉姆说，“您是百分富翁，您的三分多得不计其数。有一个乞丐来向您行乞，他说：‘敬爱的百分富翁，行行好吧，白送我一个三分吧。’现在您想想，那个乞丐就是我，我求求您……”

百分富翁和乞丐的对话使我忍俊不禁，我用手捂着嘴从教室里跑出来。

在走廊里谁也没有阻拦我，谁也没有询问什么。只有古丽科默默地陪着我走到走廊尽头，但她还没有等到我开口，便一个人落在我后面了。

我沿着楼梯走到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便回头望了一眼。古丽科站在上一层的楼梯台上，胳膊肘支着栏杆，两手托着下巴，眼睛直直地望着我。

“你干吗盯着我？”我没好气地说。

古丽科挺直身子，摇了摇头，然后走开了。

我来到楼下的大学花园里，倒在长椅上。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我面前蹲下来，用一把小铁锹挖了一点土，撒在小男孩的脚边。小男孩站在那里，像一棵小树苗似的，微笑着任凭小女孩往他脚边撒土。小女孩时不时地打量小男孩一眼，看他是否长高了，然后继续挖土。

小男孩也在等待自己长高，不停地微笑着。

五月的天气，花园里温暖宜人。

就在这个温暖的五月的日子里，由于我得了个二分，国家预算的开支部分缩减了二百七十五卢布四十戈比。^①

助学金本来就低得令人吃惊，可以说是上帝的恩赐。我是个诚实人，心里一直有三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要发给我助学金，为什么对这种上帝的恩赐还要征收所得税，为什么要我缴学费？况且我坚信，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需要助学金的了。

眼下我丧失了助学金，坐在大学的花园里，望着这个扎着蝴蝶结的小姑娘栽好树苗，然后开始给树苗浇水。

那个充当树苗的小男孩望了我一眼，微微一笑。

“你叫什么名字，小孩？”我问道。

“他叫拉莎，我叫伊娅！”小姑娘回答说。

“你为什么要往他身上浇水呢？他会感冒的。”

“为了让他长高。”

“小孩这样是长不高的。就说我吧，小时候我吃得很多，所以长得很高大，瞧见了么？”

小姑娘不相信地瞥了我一眼。

“您都吃些什么？”她突然问道。

“面包夹黄油，牛奶，香肠，馅饼……”我扳着手指列举起来。当我扳到大姆指的时候，禁不住咽了一口唾沫，不吭声了……

“现在呢？”小姑娘问道。

“什么现在？”我反问一句。

“现在您都吃什么？”

^①这里指的是1961年苏联货币改革前的旧币。

“现在？什么也没有吃。到底要吃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朝她笑了笑。

“为什么？”小姑娘又问。

“因为我丢失了助学金。”

“什么？”

“助学金！”

“在哪儿丢的？”

“什么在哪儿？”

“诺，您刚才说您‘丢失了’。您丢失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丢。我是开玩笑。”

“告诉我吧，叔叔，您丢失了什么？”

“别尔贝图姆—莫毕列。”

“什么？”

“别尔—贝—图姆莫—毕—列！”我逐个音节说出这个词组。我想，小姑娘重复不出这个词组，也就不再纠缠我了。

可是奇迹出现了。

“别尔贝图姆莫毕列？”小男孩问道。

“噢，你真的长大了！好了，从泥土里爬出来吧！”我改变了话题。

“别出来！你会干枯的！”伊娅对他说。

小男孩没有挪动位置。

“叔叔，你力气很大吗？”他问。

“是的，还行。”

“那好，你弯一下胳膊！”

我弯曲一下胳膊，绷紧了肌肉。小男孩用食指摸了摸我